

编辑

应用写作

吴添汉编著



学林出版社

編輯

应用写作

应用写作

应用写作

编辑应用写作

吴添汉 编著

DA1/05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予庭

封面设计：戴继斌

G213

WTH

442876-

95

23872

编辑应用写作

吴添汉 编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字数 170,000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600 册

ISBN7-80510-046-2/Z·2

定价：2.50元

序 言

1983年，几位老编辑聚在一起，异口同声地倡议为青年编辑开设一门“编辑写作应用文”的课程，用若干实例来证明写作是编辑必备的基本功。不久，几位同志执笔写出了初稿，并作为征求意见稿在《上海出版工作》的增刊上发表。可是一直没有定稿。这之后，对汉语语法修辞颇有造诣的高级编辑吴添汉同志挺身而出，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利用两年多业余的多少个夜晚，重新进行编选、评点、提炼、探索，边教学边修改，终于取得较好的收获，完成了人们开发这个新课题的心愿，的确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

这本书的出版，也许可以说是编辑们向社会读者的对话。可惜至今某些人还以为编辑是“剪刀浆糊手”，编辑工作是“雕虫小技”，甚至不知道出版社的存在。这本书属于内中人语，透露了出版社的一些内幕，让人们了解编辑工作是多么繁重而细致的精神劳动，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地位和作用。其实，任何以默默的奉献为特征的崇高的工作，最终总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称赞的。

这本书的出版，作者在若干章节内寻根溯源，勇敢探索，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无疑，这些对编辑学的建立，是十分有益的。这是特别要感谢作者的。

希望作者继续研究,隔几年修订一次,使之更加丰满、完善。

希望更多的编辑学理论和编辑实务的著作问世!

宋原放

1988年春节于上海

前 言

1985年春天，上海市出版局抽调我到局职工大学文科编辑班任课，教的课程便是“编辑应用写作”。这一年，又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专业兼教此课。

编辑同志成年累月地为他人出书，成千上万的书稿从编辑的手里送出，可是直接为编辑写的书却是凤毛麟角。为了教好这门课程，我翻箱倒柜，终于在百书丛中找到一本《编辑应用文》（《上海出版工作》1984年增刊），我欣喜万分，一口气读完“前记”，又一口气读完全文。我钦佩郝铭鉴、王自强、周炳侯、连洁群、杨兆林、戴子腾六位同志勇于前驱的工作，他们在莫干山的劳作没有白费，使我终于有了一个蓝本可作参考。

我在欣喜之余，又犯愁了。因为光凭这一薄薄的本子要上一个学期的课（每周二节）是很不够的，何况我的学生又是有相当业务基础和一定水平的青年编辑和名牌大学的学生，虽说是“师不必强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但教师自己总得要求懂得多一些，教材总得尽量丰富一些。我想，我国自古至今有极其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有丰富多彩的编辑应用文体和文章，这方面的专书虽少，但可资借鉴的资料一定是很多的。于是我到上海各书店寻找，只要有一点点参考价值的，我便倾囊而购，这样，居然积有几十册之多，使得我在本书正文的后面可以列出一个“参考书目”。

于是，我以郝铭鉴等六位同志所编写的《编辑应用文》为

借鉴,在阅读有关参考书的同时,结合我近三十年来的编辑实践和所见所闻,重整旗鼓,边教学边编写,写后再打印出来发给我这两个班级的学生作为教材。部分章节在《编辑学刊》上选登,以广泛听取意见。在编写过程中,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赵斌同志为我召开了专题座谈会,现在稿中有些材料就是座谈会上得来的,郝铭鉴同志也给我提了很好的意见,王自强同志为我提供参考书,周炳侯同志给了我许多鼓励。市新闻出版局所属的各个出版社,诸如上海人民、上海文艺、上海科技、上海古籍、上海辞书、上海教育和少儿等出版社的社领导和总编室的有关同志,也给了大力支持,为我提供不少编辑同志写的内部资料作为附录,出版局出版处的倪墨炎同志、科教处的史慧莉、杨守经同志,也都为我提供方便,出了力。因此,这本书稿的出版,可以说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在讲义编完后,赵斌同志又通读全稿,写了书面意见,学林出版社的曹予庭等同志,在审稿中又提出很好的意见,并帮助改正稿中的一些差错。这些都是难以用“感谢”二字来表达的,它正体现了我们编辑同志需要有自己读物的强烈的愿望和通力合作的精神。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上海市编辑学会会长宋原放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序言,给了我很多鼓励,谨致诚挚谢意。

“书到用时方恨少”,加上我的学识有限和写作水平的限制,疏误之处恐怕不少,还望广大同行同志和读者同志多多批评指正。

吴添汉

1988年2月

目 录

序 言	宋原放
前 言	1
第一章 绪 论	1
一、从编辑工作说起	1
二、我国古代编辑应用文体的写作	7
三、现代编辑应用写作的基本要求	13
第二章 书稿文件	19
一、选题报告	19
二、编辑计划	24
三、审读报告	32
四、外审报告	49
五、加工小结	51
第三章 书 信	55
一、约稿信	56
二、退修信	61
三、退稿信	68
四、日常联系信	72
五、答读者信	76
六、书信的款式	82
第四章 工作汇报	85
一、会议汇报	85
(一) 审稿、定稿会议汇报	86
(二) 学术会议汇报	94

(三) 工作会议汇报	103
二、调查报告	106
三、外出组稿、访问作者汇报	114
四、信息汇报	119
五、工作总结	122
第五章 书刊附件	143
一、内容提要	144
二、序和跋	149
三、出版说明	167
四、凡 例	174
五、按 语	180
六、作者小传	183
七、编者的话	190
八、发刊词	193
第六章 书刊评介	199
一、新书预告	201
二、书 评	206
三、出版简讯	225
四、书刊广告	230
附录：参考书目录	237

第一章 绪 论

一、从编辑工作说起

编辑应用写作,讲的是编辑在选题、组稿、审稿、书刊宣传评价等一系列工作中所进行的应用文章的写作,是编辑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的编辑工作及编辑写作是从古代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因此有必要先讲讲古代的编辑工作和古代的编辑应用写作。

编辑,作为一种职业上的名称,那是随着近代出版社的出现而产生的。可是编辑工作,在我国,那是早就存在了。我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宝藏,我国有记载的古书,据杨殿珣先生的估计,有十五万种左右(见《北图通讯》1979年第一期),现存古籍八至十万种,数量之大,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还不包括流失在国外的古书!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苏联等国,都收藏着一些我国的古书。目前,已有不少古书经过整理加工,这里边凝结着我国历代众多的文人学士从事编辑工作的心血,体现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卓著成果,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编辑工作经验和丰富的编辑应用文体文章,值得我们珍视。

我国古代的编辑工作,主要是对古书的搜集、整理。围绕这一任务,展开的一系列工作,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体系,建立起几门相应的学科,如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等,并

创造了众多的编辑应用文体,留下大量的编辑应用文章。

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不少文书材料,商朝并设有“作册”一官,负责制作和保管册命。周朝也设专管国家文书档案的官员(外史下士)担任收集保管工作。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从事古书整理工作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墨子》称孔子“如周,得百二十国宝书,诚不诬也”。《隋书·经籍志》也说:“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周室是当时藏书的中心,这就给孔子的编辑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称为六经的《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部书都是孔子编辑整理的。《乐》已失传,《易》、《诗》、《书》等是否是孔子编的,后人有疑义,但对孔子作了大量的编辑工作却都加以肯定。

西汉末年,由国家组织进行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和编辑工作。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攻伐不断,至秦始皇又于公元前 213 年下令焚毁诗、书、百家及《秦纪》以外的历史书,使我国古代的图书损失很大,所存古籍,不仅数量锐减,而且散乱不堪。因此,汉政权在文化上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要在废墟上重建中国的文化大厦。汉高祖刘邦进入咸阳后,萧何便收藏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汉武帝刘彻下诏“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记载:“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各地进献的图书很多,当时国家的藏书除秘府外,还有太常书和太史书。自元朔五年至河平三年(公元前 124—前 26 年)的近一百年间,“书积如丘山”。

汉成帝河平三年,又命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最后由刘向总其成,通阅全稿。这便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由国家组织的规模巨大的古籍

整理、编辑工作。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继承了这一事业，最后完成《七略》的编纂。刘向、刘歆父子奠定了我国古代编辑工作的基础，在编辑应用文体的写作上，也有杰出的贡献。《七略》一书，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编辑工作的一块里程碑。

刘向父子所做的编辑工作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

(一) 兼备众本。这是编辑工作的第一步，即将所能得到的书收集起来。刘向等人当时所集之书，除了天禄阁、石渠阁的国家藏书之外，还有刘向的家藏书以及一些臣僚的藏书，收书的范围比较广。

(二) 比勘文字。就是校勘工作。校勘古时称校讎，即将同一部书的不同写本、抄本进行校对，定篇目，改正文字。刘向当时是两人对校，即“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讎”。（《太平御览》卷六一八，引刘向《别录》）。后世改校讎为校勘。当时文字上的校勘工作，有这么几点：(1) 误字，即错别字；(2) 脱字，即漏字、漏页；(3) 衍文，即多出来的字；(4) 叠字，叠字也是多出来的字，不过因是紧连上文而误，即多写了同一个字；(5) 重文，多出的句子或改动句子；(6) 缺字，这里指的是原来本子上对缺字写个空围“□”，后人改为“口”字；还有本无缺字误加空围的；(7) 偏旁，有的字因受上下文的影响多写了偏旁，致使意思变了；(8) 错简，由断简造成的简编的次序错乱；(9) 混淆，正文误作注文或注文误作正文；(10) 妄加，即后人妄加的字。（参见蒋云卿著《校讎学史》一书）

(三) 审定篇第。即安排一部书的篇章次序。由于简牍错乱，不仅文字上有错，有的连篇章也乱了，要恢复原书的面貌，就得编排好篇目的次序，如刘向在《晏子叙录》中说的：“……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重复二十二篇六百二

十三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

(四) 确立书名。古代有些书没有书名,是后人加的;有的有书名却又一书多名,很是混乱。刘向在校勘文字篇章之后,再行确立书目,如他在《战国策叙录》中说:“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事》、或曰《修事》。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名为策谋,宜为《战国策》。”从此,《战国策》这一书名便流传至今。

(五) 厘定部居。就是给书分类,以便于收藏查阅了解其学术流派。这工作是刘向、刘歆父子首创的。刘向勤勤恳恳做了十九年,将整理好的图书列目分类,但尚未完成便死去,刘歆继承父志,又花了二年时间方整理完成《七略》一书,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其中辑略是全书的总略,它包括总序和各略的序,说明各类图书的内容和学术源流,它是我国古代在编辑工作中有据可查的较早的应用文体。

(六) 撰写叙录。刘向在整理图书的过程中,每校完一部书,便写一篇叙录。叙录,后人又称解题,提要,它的内容包括著录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著者的生平、思想,说明书名的含义,著书的原委与书的性质,辨别书的真伪,评论思想或史实的是非,剖析学术源流以及确定书的价值,每篇叙录就是一部书的简要介绍。后来刘向把各书的叙录汇编成《别录》一书,这是最早的编辑应用文体之一,是刘向的创造。

因此可以说,刘向父子在总结前人编辑工作的基础上,创建了我国古籍编辑工作的体系,开创了我国校勘学、目录学的先声,并且开始了辨伪、辑佚、考据等方面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刘向父子等人是我国古代编辑工作的开创者,对我国古代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范文澜同志说:“西汉后期,

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又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

可惜，《七略》大概在唐五代或宋时便失传了，佚文尚可见于《初学记》卷十一，洪颐宣的《问经堂丛书·经典集林》，马国翰的《玉函山房丛书》，严可均的《全汉文》，姚振宗《快阁师石山房丛书》诸本及顾颉光的北京图书馆藏抄本，但已看不到全书的原样。《汉书·艺文志》是根据《七略》编成的，因此从《汉书·艺文志》中可以窥视《七略》的概况。

继刘向、刘歆的《七略》之后，东汉班固又编了《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此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乃至《清史稿》均编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在正史中记下一代藏书或一朝人著作的记录。

晋代的荀勖，在整理古籍时，将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包括六艺、小学等儒家经典的书；乙部包括诸子、兵书、术数和方技方面的书；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和杂事等历史方面的书；丁部包括诗赋、图赞和汲冢书等，到了《隋书·经籍志》，使用经、史、子、集作为四部分类的名称，一直沿用到清代。

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又兴起了一股由皇帝亲自提倡编辑类书之风，如魏文帝曹丕下令命王象等人编的《皇览》，梁武帝时徐勉等所撰的《华林遍略》、北齐祖珽等撰的《修文殿御览》等。这时还出现了由个人主持编辑的文集，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陈徐陵编的《玉台新咏》等。

唐代的编辑工作，除编写《唐书·艺文志》这一官修目录外，又编了几部大型类书，有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等二

十人编的《艺文类聚》、徐坚等人的《初学记》、白居易与宋孔传的《白孔六帖》等，宋代也有几部大型的类书，如李昉等《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王钦若、杨亿等《册府元龟》、王应麟《玉海》，明代有大型的类书《永乐大典》。宋代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书的版本也多了。宋、明、清三代，编书和刻印有三种：由皇帝下令编印的钦本；由各官府主持编刻的官本；由民间编刻的坊本、家本，因此版本学也随着兴起，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便是我国第一部记录书籍版本的著作。

清代是我国封建时期编辑工作的鼎盛时期，不仅编了大量的目录书，还编了规模巨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和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为《四库全书》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是我国古代编辑应用文体写作的巨大成果。

有清一代，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等都有很大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著作。

可以说，刘向之后，几乎每个朝代都设置了校勘、编辑古书的官吏，有校理、校书郎、春官校书下士、宏文馆校理、集贤殿校理、集贤校理、秘阁校理、崇文院校勘……尽管各个朝代的称呼有些不同，但其职务大同小异，可以说，他们都是古代官家的编辑。

除了官家编辑外，还有许多文人学士，从事着古书的校勘、点校、目录、版本、辨伪、辑佚、注释、考据等工作，他们可以说是私家编辑，如东汉的郑玄、高诱，晋代的荀勖、束皙、杜预、颜之推，唐代的吴兢、颜师古、陆德明、李善，宋代的郑樵、晁公武、陈振孙、岳珂，元代的马端临、吴师道；明清时期那就更多了，如毛晋、范钦、高儒、周弘祖、祁承燾，钱谦益、顾炎武、章学诚、黄丕烈、鲍廷博、钱曾、毛扆、孙星衍、卢文昭、惠栋、戴震、

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王鸣盛、吴大澂、孔广森、马国翰、严可均、朱骏声、俞樾等，真是举不胜举。

总之，我国古代从事编辑工作而卓有成就的文人学士，犹如众星之列河汉，璀璨夺目，他们对祖国文化宝库的建设出了力，作出很大的贡献，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汲取。

二、我国古代编辑应用文体的写作

我国古代编辑应用文体的写作，可以说是和古代编辑工作差不多同时开始的，如司马迁和班固都说，《尚书》的序言是孔子写的，这个说法因证据不足，被后人否定了。东汉的陆机说《诗经》的大序是卜商写的，但范晔则认为是东汉的卫宏写的，不过赞成卜商（即孔子的学生子夏）写的人比较多。目前这篇序言究竟出于谁的手笔仍未定论。

证据确凿的第一个大量撰写编辑应用文体的是刘向，其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刘向第一个使用了叙录这种应用文体，即后来的解题、提要，内容提要，并有大量的序言和表奏。刘向之后，又有小传、注释（书名后的注释，不是字词的注释）、题跋、按语、书信、札记、读书笔记（指对书籍版本、目录等考证方面的）、凡例、书评等应用文体相继产生，真是琳琅满目、耀眼光辉。这些应用文体我们在以下的章节里还会讲到。这里介绍古代编辑应用文体写作的几个特点：

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一文中，总结了我国2000多年来目录编辑工作（编辑工作之一）的经验，指出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便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就是分清学派，这主要通过图书的